

二十一世紀評論

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潮

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

高超群

中國自改革以來，無論是高層還是民間的政治，始終充滿意識形態或政治思想的分歧和鬥爭。這種政治思想鬥爭，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改革得以實現和推進的前提。這也是中國與一般威權國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徵。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政治高度統一——即所謂「不爭論」——的前提下實現的。但事實上，自改革以來，無論是高層還是民間的政治，始終充滿意識形態或政治思想的分歧和鬥爭，極具張力，有時衝突還非常激烈。這種政治思想鬥爭，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改革得以實現和推進的前提。這也是中國與東歐國家以及一般威權國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徵。這種政治思想鬥爭的性質、模式和意義，現在的研究還非常薄弱，我們尚無法勾勒出一個大致的框架。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發展歷程。在1989年之前，中國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是要不要改革。保守還是改革，這種爭執非常尖銳，導致了兩屆總書記的非正常離職。1992年之後，問題變為：要甚麼樣的改革？學者們糾結爭論的問題是「左的還是右的？」。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生了體制內外的斷裂。在體制內的保守派和激進改革派，特別是主張政治改革的力量，要麼被清洗了，要麼被邊緣化了。體制內精英實現了短暫統一：團結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場化。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三個主要的政治派別。其一是體制內的市場改革派，作為主流，他們基本退出了意識形態領域，埋頭政績，很少關注體制外的爭論。體制外則分裂為要求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對市場化經濟改革的「左派」，他們基本只是活躍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主流的市場改革派的行為和實踐作出評價。

主流市場改革派的共識並不穩定。當時，這些改革派大多在內心中相信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邏輯或思路。然而，後來的歷史並沒有沿着這樣的邏輯前

* 本文發表前，曾得到金觀濤、劉青峰、錢永祥、高全喜、于向東、余世存、秋風、陳宜中、任峰、白龍等諸位師友的指正，諸位先生提出頗有價值的意見，令筆者受益匪淺。另，本文曾在「北京政治學青年論壇 2011」上宣講，評議人王利先生與諸位參加討論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和批評，在此一併表示感謝。當然，文責自負。

進，而是發生了逆轉。於是產生了今天的分化：一部分人依然堅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認為政治改革的實施應該更穩妥些；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中國正在創造甚至已經創造出新的、好的政治模式，沒有必要實行政治改革。

產生這種變化的一個背景是，從2008年以來，改革本身已經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就體制內而言，其改革共識開始破裂，精英們開始爭奪改革的主導權；或者更坦率一點說，他們是要爭奪改革的勝利果實。就體制外而言，許多人認為，如果把改革看作朝向某一個方向的有意識地、不斷地變動的話，改革已經死亡，已經被維穩取代。所謂「維穩」就是要維持現有秩序的穩定，承認既有的利益和秩序格局是合理的。

但在現實的政治分析中，人們還在沿用舊的分類方法談論中國的政治派別——「保守／改革」、「左／右」。這些分類方法已經不能反映今日中國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也常常會帶來分析上的混亂。比如：通常被認為是左派的人，既包括支持經濟壟斷和政治強權的人，也包括同情底層、吶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場的人，也包括支持勞工運動，維護弱勢群體的人。也有人用××黨和×派這樣似是而非的分類方法來認識中國的政治。這種分類的錯誤在於將短期的權力聯盟，看成長期的政治分歧。事實上，即使在××黨內，也有不同的主張，而×派的主張是甚麼？誰也不知道。顯然，這樣的派別只是權力派別，不是政治思想派別。它們的爭鬥只與權力的份額有關，並不會對中國政治的發展走向產生真正影響。

因此，我們需要用新的分類方法來重新描繪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本文主要談論的是精英之間的政治思想分歧，這也是當下中國真正重要的政治分歧。在本文中，民眾只是作為一種被動的政治力量而加以考慮。

筆者將中國當下的政治思想派別分為四種，佔據主流地位的是：溫和國家主義派^①和自由市場派；此外，還有兩種比較邊緣的思想派別：政治民主派和社會革命派。

關於本文還有一點需要說明，那就是如何看待利益與觀念的關係。利益如同一把冰冷的剃刀，它斬斷了束縛着我們的種種意識形態、道德枷鎖，釋放出了人的欲望，從而締造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繁榮。但它也斬斷了人和人之間的有機聯繫，並通過重新塑造精英和大眾的心靈、氣質以及政治態度，逐漸開始改變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資源的形態及其分布。因此，離開利益談論政治和思想，在當下的中國無疑是幼稚天真的。

但這並不意味着運用經濟決定論或階級分析法來描繪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是恰當的；事實恰恰相反：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並沒有隨着城鄉差別、貧富分化而加劇，在中國，階級意識仍然非常淡薄。這是因為，利益成為個人價值的核心理，每個人通過捍衛自己的利益來表達和捍衛個人權利。利益使個體更加獨立，但也使他們彼此疏離。因此，單單依靠利益本身，社會並不能自發整合，也不可能產生政治派別；必須借助觀念的塑造，個別的利益才有可能成為集團的利益、特殊的權利也才有可能成為普遍的權利，社會的分化與整合才有

在現實的政治分析中，「保守／改革」、「左／右」這些分類方法已經不能反映今日中國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也常常會帶來分析上的混亂。筆者將中國當下的政治思想派別分為：溫和國家主義派、自由市場派、政治民主派和社會革命派。

可能實現。因此，我們在分析當代中國政治思想時，應當注意到利益與觀念之間的相互塑造，並且逐漸整合的過程，而不應簡單地以為它們中的一個決定了另一個。

可以觀察到的是，利益與觀念的結合，在今天日益成熟。因而，政治的分歧也從純粹的思想分歧，落實為具體、切實的利益鬥爭。這將會使思想的鬥爭愈來愈激烈、愈來愈真實，而不再只是知識人茶杯裏的風暴，或者私下的牢騷。換句話說，利益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外衣，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肉身。在本文中我們只是呈現兩者初步結合以後的結果。

隨着利益愈來愈凝固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化進程也會逐漸加快。在這個進程中，中國的思想自由或許會面臨更為嚴酷的社會環境：每個人都被迫要在這種思想格局中選定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得不選擇你並不完全信服的某種立場。

一 溫和國家主義派

隨着利益愈來愈凝固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化進程也會逐漸加快。在這個進程中，中國的思想自由或許會面臨更為嚴酷的社會環境：每個人都被迫要在這種思想格局中選定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得不選擇你並不完全信服的某種立場。

溫和國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是以國有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利益集團與一部分官僚集團、特殊的高層政治集團的結合。從1992年以來，這個聯盟在利益上逐漸坐大，並開始形成穩定的政治主張，但他們始終遭到整個社會的普遍抵制。雖然他們握有巨大的資源，是中國真正的統治者，但他們沒有話語權、沒有擁護者，只要在公共領域稍一露頭就會遭到嚴厲的抨擊。不過，他們成功利用了人們對改革過程中不公正的不滿，對整個社會依照金錢的力量來重新等級化的現實不適應，以及市場、利益關係對中國人熟悉並倍感親切的人倫關係的傷害，成功扭轉了自己在公共輿論中的頹勢，並進而在權力格局中擠佔了自由市場派的地位，開始佔據政治舞台的中心，雖然他們自己也是那些他們批判的現實的製造者之一。在今天，他們開始嘗試闡述和傳播自己的主張，並對其進行有意識的系統化和理論化。

詭異的是，溫和國家主義派的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竟然是來自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受到最嚴重剝奪的階層，以及一些曾經嚴厲批判市場化改革的「左派」。與批判市場化改革的「左派」結盟，使他們大大改善了自己在公共輿論中的被動局面，而這些「左派」的政治主張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從最激進的底層利益維護者變為最保守的壟斷階層利益維護者。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他們最有可能收穫改革成果。此外，這種政治主張也與官方所宣傳的意識形態契合程度最高。

他們的政治主張，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內容：嚮往偉大國家，從內心中憎惡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認為中國將成就一種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文明類型。這種文明類型將汲取傳統中國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優勢，將更多地從傳統中國二千年的文明中尋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們鼓吹民族優越論，不同程度地

肯定傳統中國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父慈子孝的家庭關係、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價值、溫良恭儉讓的人倫關係，乃至認為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天下主義將為整個世界提供新的國際關係結構、以自然和諧為核心的天人關係將為人類提供新的人和自然關係。他們強調國家利益，認為個人利益應該服從國家利益，並以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榮，批判市場和個人價值，鄙視個人利益、金錢關係。他們反對冷冰冰的法治，強調在統治者與群眾之間建立血肉聯繫。

在經濟上，他們強調國有經濟的作用，認為國有企業保證了強大國家的經濟基礎，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應該加以保護和支持，並經常以此為由反對外資企業與民營經濟，認為前者危害民族利益，後者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黑心資本家的溫牀。同樣，他們支持一個強大的、有效的集權式中央政府。與經濟政策上的右傾相比，他們的社會政策則相對左傾，主張給下層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及強有力的保護；在收入分配中更為傾向底層，但反對弱勢群體的自我壯大和成長，對公民社會的發展更是不屑一顧。

同時，他們正在嘗試建立統治者與民眾之間的直接關係，並嘗試用一種溫和的手段，在可控的範圍內動員民眾，並以此削弱法律和市場對整個社會的重構。這種動員主要表現在宣傳手段和文化主張上，強調對勞動大眾生活的反映和對他們的價值觀的重視，並試圖通過提供保護來換取民眾在輿論上的支持，以壓制其他的精英階層，尤其是中等階層和民族資本。他們也呼籲在利益分配上向底層的傾斜。

溫和國家主義者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貧富矛盾，他們試圖將民眾憤怒的禍水西引，指向精英群體的另一部分，以便自己取得主導者的地位。

溫和國家主義者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貧富矛盾，他們試圖將民眾憤怒的禍水指向精英群體的另一部分。他們的支持者的心理動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整個市場化、法制化進程中遭受到挫折感和被剝奪感；另一種是相信一個至善的統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



很多中國民眾相信，一個至善的統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

他們的支持者的心理動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在整個市場化、法制化進程中遭受到挫折感和被剝奪感：受這種心理動機支配的人往往是對政治不是特別感興趣的民眾，只是希望獲得復仇的快感，看到昔日高高在上者倒霉。這些民眾對於政治並沒有太明確的目標，他們也並不真正支持某種特定的政治主張，或者並不明白自己到底支持甚麼主張。他們很有可能是最不懷好意的看客和圍觀起哄者。

另一種心理動機則是：相信一個至善的統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大多數民眾不自覺地或多或少受到這種心理動機的影響，他們對於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深懷希望，希望得到他的保護。他們對於獲得「特權」比對於獲得「普遍權利」更有興趣，他們認為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可以明辨是非、洞悉民生疾苦的超然領袖、黨派，給「好人」以「好報」。因為生活經驗告訴他們，那些抽象的法律條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對他們而言是過份遙遠的、無法祈求的；而強人和政府的保護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的。

溫和國家主義派的影響力正在不斷上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政治「台上派」中的主流派。但他們要面對的現實或許會使他們的主張大打折扣。這是因為：

第一，這種主張需要的動員力量，特別是中等階層和官僚系統的支持，是當下這個溫和、唯利是圖的社會所不能提供的。特別是經過三十年理性化、技術化轉型的官僚集團，對於過份理想化的訴求有着天然的排斥心態，或許不久的將來，官僚集團對這種主張的抵制和疑慮就會顯現。溫和國家主義者懷有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人的雄心，卻很可能要面對意大利式的社會狀況。

第二，雖然支持這種主張的政治精英曾經深入底層，但與第一代共產黨人不同。他們並不真正打算動員民眾、服從民眾，和民眾站在一起，而是懷着一種統治者的心態，自以為深悉民眾的各種弱點，並懂得如何毫不手軟地利用這些弱點。底層民眾僅僅只是他們手裏的工具，而不是未來中國的主人翁，他們不會用自己巨大的力量為底層民眾的未來開道。他們很可能只是第一代共產黨人的失敗模仿者，就像拿破崙三世模仿自己的叔叔，不太可能開創出拿破崙一世那樣的政治新局。

第三，好大喜功，過份自信，會造成他們的輕率盲動，這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天然弱點。長期以來，他們對在內政和外交上無所作為的執政者心存蔑視，早想一展雄圖，更何況他們天生熱衷大戰略、崇拜英雄和強者。

第四，在他們的政治主張與經濟主張之間有着巨大分歧，國營經濟體系顯然不能作為偉大國家的基礎；更為致命的是，在他們的上層精英和群眾基礎之間，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如何滿足嗜利的群眾分享國有經濟體系好處的願望？這不僅需要巨大的利益調整，更需要複雜的制度變遷。

第五，統治階層雖然因為既得利益或者自滿心態，而滿足於現有體制，但因為利益的分割，即使在統治階層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不同的行政和黨務部門之間、不同地域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都有着相互衝突的利益和觀

溫和國家主義派的政治主張與經濟主張之間有着巨大分歧，國營經濟體系顯然不能作為偉大國家的基礎；更為致命的是，在他們的上層精英和群眾基礎之間，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如何滿足嗜利的群眾分享國有經濟體系好處的願望？

念訴求。試圖用建設偉大國家的理想，來重新塑造這些利益主體，抹平他們的利益和觀念差異，這種想法有些過於浪漫。

但是，這個派別在兩個很重要的方面，有效地回應了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其一，從內部講，隨着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整個社會有一種瀕臨崩潰的危機感，官民之間的衝突不斷增加。這種主張成為除了民主化之外，最鮮明、也最具建設性的一種克服官民矛盾的可能，並且獲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其二，從外部講，中國國力的增強，再加上百年來的歷史恩怨所激發的民族情緒，使得中國人尋求文化認同和民族自豪感的需求急劇上升。此外，隨着中國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深入，兩者之間的矛盾也愈來愈頻繁、日常，如何在這些矛盾中捍衛國家利益、提升中國的國家地位？這種主張的回答儘管未必清晰，更未必可行，但無疑最富吸引力。

二 自由市場派

自由市場派大約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最為持久的一個政治派別了。他們的基本主張從1980年代以來，沒有太大變化。雖然這種主張從未得到官方的公開認可，但它始終承擔着為經濟改革提供方向和評價標準的功能，甚至在政治領域也是如此。這種主張從1980年代的全民信仰，現在基本演變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旗幟。它的提倡者主要是體制內一部分開明的官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學者，他們是1980年代以來改革派的自然延續。近年來，它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愈來愈多的挑戰。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自由市場派就會成為體制內最大的反對派。他們與溫和國家主義派之間的張力，會成為中國政治的一個新焦點。

自由市場派的思想主張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簡單地說主要包括如下內容：在政治上實現自由化和民主化，通常非常重視選舉民主，特別重視法制和法治，主張社會自主發育，反對政府過度介入社會本身；在經濟上主張市場化，非常激烈地反對國營企業的壟斷地位；在文化上重視個人價值，反對任何形式的強制，主張對每個個體的尊重，特別是對每個人的利益的尊重；在對外關係上，通常比較親西方。

但對於以上這些主張，他們通常都不能決絕地貫徹到底。雖然不滿專制，但對於專制的現實，卻有很高的容忍度。因為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有義務、有能力改變現實，還經常出賣他們當中的激進者，劃清自己和他們的界限，從而導致了那些激進者從他們當中溢出，成為政治民主派。雖然主張法制或法治，但每當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的時候，往往會動員各種資源，尋求特殊保護，而不是運用法治的力量。雖然主張保護產權，但對於別人的產權的保護，卻並不那麼在意，有時甚至還加以蓄意侵犯。

在1980年代，這種主張推動了中國的改革：它與官方的意識形態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動，並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輿論支持，助長其成為中共的主流派。

在1980年代，自由市場派的主張推動了中國的改革：它與官方的意識形態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動，並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輿論支持，助長其成為中共的主流派。在1990年代以後，這種主張深入大眾，尤其是在媒體上獲得了巨大支持。

在1990年代以後，這種主張深入大眾，尤其是在媒體上獲得了巨大支持。它在體制內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強，大部分官員在私下都會高度肯定這種主張的正當性，在他們處理具體的行政、司法事務時，都會盡可能地效仿西方的成例，並以此作為改良其工作的方向。

雖然媒體與體制內官員都受到這種主張的影響，但二者之間並未成為同盟，他們在思想上一致，在政治立場上卻尖銳對立。這種情況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並逐漸加劇，主要表現為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對立，媒體對體制的批判日益犀利，政治精英逐漸地對知識精英與媒體喪失了政治信任。經過長期對峙，二者漸行漸遠，結果是：前者喪失了影響政治的能力，後者喪失了輿論的支持。

進入新世紀以來，官僚集團內部出現了分歧，一部分接受了溫和國家主義派主張的官員，開始反思自己先前對於自由市場的過份信任，並努力尋求新的合法性依據，探索新的出路。主張市場改革的官員往往首當其衝地成為指責與反對的對象，有時甚至會腹背受敵。他們無力開拓新的改革領域，卻要為改革時代出現的所有問題買單。然而，自由市場派從改革伊始，就始終遭到來自體制內的質疑，因此，體制內的質疑並不能削弱他們，反倒會激發他們的鬥志。對他們最大的打擊，或許來自於民眾的不信任和媒體的批判。因為在自由市場派看來，其主張是為了百姓，為了未來中國的，而不是服務於自己的集團利益，甚至有時會犧牲自己的利益。而且，長期以來來自民眾的道義支持是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本，今天卻遭到唾棄，由此所受到的心理打擊可想而知。或許正是因為民眾支持的弱化，使得他們極為現實地尋找新的支持點——民族資產階級，這樣一來，其主張與利益之間的重合度反而大大提高。

總體來說，自由市場派由於其在行動上的軟弱、主張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為被攻擊、詰難，乃至嘲笑的對象，逐漸處於守勢。他們往往口頭上非常激進，在行動上卻非常克制。這一方面使得反對者覺得他們色厲內荏，另一方面，擁護者則覺得他們虛偽、自私。他們也許很快就會從改革的主導者變為旁觀者。儘管自由市場派的支持者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仍然廣泛存在，甚至在權貴階層中也不乏支持者，但這種主張已經過了自己的上升期，其動員力開始下降。在處於上升期的時候，它未能實現組織上的整合^②，使得今日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呈現出一副無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悲慘模樣。

在自由市場派處於上升期的時候，他們本有機會成為民族命運的擔綱者，把他們的利益訴求普遍化為整個民族的要求，使他們成為民眾的領袖。但他們錯過了歷史的機遇。或許在內心裏，他們也在期盼一個拿破崙式的強人，為他們打開通向未來的大門吧。他們缺乏開展宏圖大業的氣魄和眼界，從沒有想過成為自己的主人。

近年來，自由市場派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轉而支持政治民主派。自由市場派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與保守的矛盾、市場與計劃的矛盾、法治與人治的矛盾。

自由市場派由於其在行動上的軟弱、主張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為被攻擊、詰難，乃至嘲笑的對象，逐漸處於守勢。他們往往口頭上非常激進，在行動上卻非常克制。這一方面使得反對者覺得他們色厲內荏，另一方面，擁護者則覺得他們虛偽、自私。

由於溫和國家主義派逐漸得勢，自由市場派的主張從一種隱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變為一個單獨的思想派別。它的作用在於凸顯精英集團內部的矛盾。但從總體上來說，這種主張的內部整合程度並不如溫和國家主義派，或許因為後者是以反對派、挑戰者的面目出現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邊界。而自由市場派似乎還沒有在這個挑戰者面前清醒過來，它還在用老的辦法，比如指責對方反對改革，來打擊對手，而沒有實現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針對如何實現強大國家，如何讓民眾生活幸福等等問題）、組織收縮（在政治上，與溫和國家主義者鮮明決裂，而不是把矛頭對準對改革有怨氣的民眾）。因此，自由市場派衰落的態勢似乎還沒有終結。

三 政治民主派

政治民主派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主流是從文革後期西單民主牆以來，始終在中國社會時隱時現的反對派力量。1989年是這一派別影響力的最高峰。此後因為受到巨大的打擊和迫害，他們逐漸從主流社會的視野中消失潛隱。另一個源泉是從1992年以來，不斷被體制擠出的激進人群，他們或者因為生活遭際，或者因為個性原因，被迫脫離了生活的常規，並敏銳地將個人的遭遇與整個體制的弊端聯繫起來，從生活經驗出發對現行體制產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

政治民主派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驅追溯至反右、以至民國的知識份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們往往以自由主義的正宗傳人自居。在實踐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進派和偏向改良的溫和派兩種。他們毫不掩飾對於一黨專政的厭惡；對於多黨制民主的嚮往，可以說是他們最為核心的追求。與自由市場派相比，他們更為接近底層，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遭受損害與侮辱的群體，他們甚至和訪民、教徒結合在一起，對於這些底層民眾給予極高的同情，並開始有意識地通過接觸來動員和組織他們。

這個派別通常認為底層苦難不幸的來源是政治上的專制、缺乏自由、沒有法治。因為他們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際上與這些底層民眾有類似的經歷。經過多年艱苦的努力，他們獲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時，他們也會用底層的革命來嚇唬和威脅統治者，促使他們開展政治改革。不過，從根本上講，他們基本上不太認同與執政者合作的漸進改良道路。由於真誠的理想主義，敢於向強權挑戰，甚至不惜為此付出代價，他們常常得到媒體的高度認同和道德褒獎。在所有的政治派別中，他們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這是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是從正常的生活常態中溢出的，因此雖然脫離了和其他階層的聯繫，但在個人交往上，他們卻可以深入到每個階層，並因其敢於犧牲的理想主義，受到較之其他派別更多的同情和幫助，並據此建立了廣泛的社會網絡。在這些網絡內部，他們之間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認同程度很高。

自由市場派的作用在於凸顯精英集團內部的矛盾。但這種主張的內部整合程度並不如溫和國家主義派。它還在用老的辦法，比如指責對方反對改革，來打擊對手，而沒有實現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組織收縮。因此，自由市場派衰落的態勢似乎還沒有終結。

可以說，雖然很少有人有勇氣追隨他們，但對他們的同情遍布四方。這種主張對於民眾，特別是城市中的中低階層，有極大的潛在號召力。

由於幾乎沒有回頭過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們非常堅決和勇敢，行動能力非常強。隨着「80後」和「90後」的加入，他們的行動更為靈活多樣，也更為積極主動。雖然1989年的悲劇依舊是他們的心結，但其救國救民的悲情意識在不斷減退，對於普通民眾的冷淡開始抱有較強的寬容性，更多的參與者把反抗視為個人的意願。在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特別是大型國企的壟斷地位上，他們和自由市場派高度一致。但總體來說，對於財富和資源的分配，他們沒有太多明確的主張。

他們對於現實的批判往往從個人經驗出發，非常有穿透力；對於種種掩蓋真相，打壓反抗者、侮辱受害者的行為總能感同身受，常常自發援助圍觀，有時甚至能對事件產生較大影響；而在這兩個方面，他們都得到了媒體的有力支援。同時，他們往往和社會的自組織力量形成友好同盟，從業主委員會、環保組織、各種民間NGO，到中小企業的自發組織，都有很多這種政治主張的同情者，政治民主派也都可以指望從他們那裏得到實質性幫助。

在現實的政治格局中，他們實際上是自由市場派的激進形態。與自由市場派強調利益不同，他們更為關注權利。權利與利益密切相關，但二者也有着鮮明差別：利益是具體的、特殊的，而權利是抽象的、普遍的。從總體上來說，兩者在思想主張上有很多接近之處，但各自依賴的階級基礎則有很大差別。政治民主派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動力要遠遠高於自由市場派，在網絡上和媒體上與溫和國家主義派展開有效論爭和爭奪群眾的，是他們，而不是自由市場派；採取種種抗議行為捍衛產權、公民自由的，也是他們，而不是自由市場派。他們很少得到來自自由市場派的資源和道義支持。

政治民主派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與缺乏基本人權的個人之間的矛盾，其他的種種矛盾則是這種矛盾的衍生和變化。在他們看來，官民衝突的前景必然是整個國家的民主化。

總之，與二十年前相比，他們在政治上更為成熟，也更為堅韌。他們不再對上層給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眾的認同，在精神上較為自足和獨立。

他們或許是在民情上最為接近中國現實的政治派別，因為他們不鄙視民眾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勵民眾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場。隨着政治分歧的加劇和演化，這個派別和自由市場派的結合會非常容易，而這兩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將使兩者形成巨大的互補，其政治能量將大大增加。

四 社會革命派

社會革命派就是通常所說的「毛派」。他們興起於199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出現較為嚴重的貧富分化之後。雖然他們有時把自己的政治譜系追溯到晚期的毛

政治民主派基本上不太認同與執政者合作的漸進改良道路。在所有的政治派別中，他們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他們實際上是自由市場派的激進形態。與自由市場派強調利益不同，他們更為關注權利。他們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動力要遠遠高於自由市場派。

澤東、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幫」等等，但實際上並沒有太多的組織和思想聯繫。這個派別因其激進和偏狹，基本上完全為主流社會所排斥。他們激烈否定中國的改革開放，認為這個過程造成了中國的貧富分化，形成了對工農群眾的新的壓迫和剝削，並認為暴力革命或者階級鬥爭將是改變現實的有效手段。其活躍份子多為老特權階層及其後代、國營工廠的老工人，以及年輕的知識份子。

他們的核心主張是對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雖然表面看起來，他們希望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但那只是少數人的嚮往，對其擁護者而言，僅僅是一種情緒表達。是否重回毛澤東體制，是否要展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是否要無產階級專政，其擁護者並沒有太多認真的思考。民眾只是不滿當下的腐敗、貧富分化，以美化過去的方式來凸顯當下的邪惡。只有一小部分知識份子在系統地進行理論工作，但這種努力很難得到民眾的有效呼應。

在網絡上和輿論上，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民眾對於貧富分化、特權腐敗的厭惡情緒的一種宣洩。而且這種影響力，很可能會被溫和國家主義派收割。因為他們的大多數主張都能被溫和國家主義派所覆蓋，而後者又有他們根本無法比擬的強大行動能力和資源分配能力。在對自由市場派的鬥爭中，他們和溫和國家主義派走在了一起。但其可悲之處也在於，隨着溫和國家主義派逐漸成為主流，他們將與「五毛黨」愈來愈難以區分，也愈來愈難以真正站到底層民眾的立場上來說話。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依然同時主張溫和國家主義和社會革命，而不自覺兩者之間的天塹鴻溝，但當社會衝突更為激烈尖銳的時候，尤其是當溫和國家主義成為主流的時候，這個派別會出現分化：一部分會追隨溫和國家主義派，另一部分會和政治民主派結合在一起，成為底層的代表。

作為一個政治派別，他們在言辭上極為激烈，行動能力卻很低下。因為在面對政府時，社會革命派往往表現得非常糾結，有時還非常懦弱，他們很難組織起有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與真正的底層抗議者很少結合。因此，雖然他們的面目讓整個主流社會震驚，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多大的政治能量。這個政治派別完全依賴於民眾而興起，但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思想上，他們都不具有掌握民眾的能力。

雖然表面看起來，社會革命派希望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但那只是少數人的嚮往。是否重回毛澤東體制，是否要展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是否要無產階級專政，其擁護者並沒有太多認真的思考。他們只是以美化過去的方式來凸顯當下的邪惡。



同一個世界，不同的夢想。

五 打開政治的大門

在當下的中國，精英之間的分歧實質上是中國政治最迫切的矛盾。但這種分歧只是政治危機的開始，如果精英之間不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的話，民眾將湧入政治的場域，其前景將是民眾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進程中，精英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但他們始終維持着一種鬥而不破的政治局面。這種政治張力保證了中國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顧、平衡多種利益訴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執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縛。最為經典的政治組合就是鄧小平和陳雲之間的政治合作。但隨着利益集團逐漸成形，各個集團逐漸喪失了相互之間的政治信任，舊有的處理利益衝突的機制、政治威望、意識形態漸次失效。精英們開始嘗試動員民眾；而民眾正在由猶疑的圍觀走向試探性的呼應，正在從克制上訪、有限洩憤，走向有意識的報復和破壞。

如果精英們不能再依照舊有的遊戲規則決定中國的未來：在華麗會議桌下拳打腳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過協議，一旦動員民眾的大門打開，政治的未來就不完全取決於精英集團。他們所掌握的各種權力的、金錢的、思想的資源，也就必須經受民眾的考驗。那時，中國政治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最後，筆者要說明，所有這些政治思想，都有着偉大的傳統，它們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對錯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間沒有高尚低賤一樣。或許我們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對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衝突，並在衝突中學會理性地解決衝突。暴君尼祿 (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 的顧問塞涅卡 (Lucius A. Seneca) 說過：願意的人，命運領着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着走。從這點上講，筆者是樂觀的。

在當下的中國，精英之間的分歧實質上是中國政治最迫切的矛盾。但這種分歧只是政治危機的開始，如果精英之間不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的話，民眾將湧入政治的場域，其前景將是民眾和精英的矛盾。

註釋

① 最初筆者使用的概念是「溫和法西斯主義」，其靈感來源於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時代」的提法(余世存：〈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癸未歲末的斷想〉，www.shezu.net/666/dispbbs.asp?boardID=63&ID=1848)。很多師友對這一概念提出了頗多質疑，並認為應該用「國家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提法。對應於現實，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威權主義都不是那麼準確，很難做到名實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國史的學友指出，法西斯主義比國家主義更為狹窄，其所指非常明確。經過權衡，筆者放棄了「溫和法西斯主義」這一提法。當然，對於未來中國而言，某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的前景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② 雖然受自由市場派影響的人群數量和範圍都非常廣大，但因為這種主張僅僅是嚮往一種理想化的未來而不是通過利益把大家團結在一起，而且始終未能得到公開表達的空間，只能用影射、私下傳話等扭曲的方式傳播、溝通，所以這些主張者很難產生集體行動，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連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這是中國和台灣以及其他東亞民主國家的重要差別之一。

高超群 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